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6.02.011

非农就业何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张永峰¹, 雷建², 路瑶³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管理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3; 2. 清华大学 五道口金融学院, 北京 100080;
3.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 非农就业不仅促进了农村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 还提升了农村家庭通过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化解财务风险的能力, 从而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7、2019年的数据, 从入不敷出和资不抵债两个维度测量家庭金融脆弱性, 分析发现: 非农就业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存在金融脆弱性的概率, 且该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 非农就业能够通过扩大农户社会网络、提高农户收入稳定性、增强农户金融可得性3条路径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随着非农就业人员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学历的提高而增强; 在第三产业非农就业比在第二产业非农就业具有更强的家庭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 非农就业同时降低了农村家庭入不敷出和资不抵债的发生概率, 其中, 对入不敷出的缓解作用更强。因此, 应通过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促进其向非农产业转移, 并着力推动非农就业规范化, 强化对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帮扶, 以充分发挥非农就业提升农村家庭财务韧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社会网络; 收入稳定性; 金融可得性; 现金流量; 资产负债; 家庭财务韧性

中图分类号: F323.6; F832.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8131(2026)02-0145-15

引用格式: 张永峰, 雷建, 路瑶. 非农就业何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J]. 西部论坛, 2026, 36(2): 145-159.

Zhang Yongfeng, Lei Jian, Lu Yao. How does off-farm employment alleviat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 rural households? [J]. West Forum, 2026, 36(2): 145-159.

* 收稿日期: 2025-11-05; 修回日期: 2026-02-18

基金项目: 江苏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专项课题(ZX25037)

作者简介: 张永峰(1992), 男, 湖北咸宁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E-mail: 752699897@qq.com。雷建(1995), 男, 贵州遵义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路瑶(1978), 女, 江苏射阳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

一、引言

家庭作为经济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其金融稳健是保障金融系统稳健运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然而,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债务增长较快,家庭财务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健性受到冲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5)》和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全球家庭部门信贷统计数据 displays,2024 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达到 69.8%,高于新兴市场 46.6% 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 67.0% 的均值。与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和健康风险等不同,金融风险天然具有传染性,以家庭金融脆弱性为代表的家庭金融风险通过资金借贷、信用背书等一系列金融行为将风险传递至整个金融系统,从而对宏观金融稳定 and 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极端情形下金融风险的传染甚至会突破国家边界,在全球内蔓延,危害极大(张冀等,2022)^[1]。家庭债务的增长虽然有助于放松预算约束,实现家庭支出的灵活性,但同时也会加大家庭偿债压力,降低家庭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农村家庭,收入来源相对单一,且自然灾害冲击导致农业收入稳定性较差,加之长期存在的针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金融排斥,其金融脆弱性显著高于城镇家庭(徐佳等,2022)^[2]。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各种因素,以寻求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有效路径。

家庭金融脆弱性指家庭因无法及时、有效或者完全履行应当承担的债务而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Ampudia et al., 2016)^[3]。其中,债务不仅包括金融债务,还包括为平衡预算、满足基本食品和住房需求等产生的欠款(Anderloni et al., 2012)^[4]。更广泛地,家庭财务脆弱性刻画了不确定性冲击下家庭无法承担各项支出的财务状态(Lusardi et al., 2011)^[5]。收入是家庭支付日常开销和偿还到期借款的基础,收入波动也就成为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关键因素(Daud et al., 2019)^[6]。如退休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大幅下降,会削弱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抵抗能力,从而增加家庭金融脆弱性(龙海明等,2024)^[7];医疗保险既能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又可以降低家庭医疗支出,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周博文等,2024)^[8]。此外,债务杠杆过高使家庭利息偿付负担加重,财务自由度收窄,对家庭流动性资产持有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最终导致家庭流动性储备无法有效应对收支不确定性冲击而陷入财务困境(李波等,2022)^[9]。

收入水平的大幅下降会严重削弱家庭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成为诱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主要原因(龙海明等,2024)^[7]。因此,切实提高家庭收入、维护家庭收入稳定成为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主要路径。对农村家庭而言,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情景下,非农就业依然是改善家庭收入的主要路径。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可以在更大空间和产业范围内,依据家庭禀赋和风险偏好,做出符合家庭效益最大化的就业选择(王春超等,2018)^[10]。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可以提高家庭成员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从而增加家庭总收入(向国成等,2013)^[11]。另一方面,通过家庭成员职业的多样化,劳动力转移到边际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有助于增加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向国成等,2017)^[12]。同时,面对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和较大的不确定性,农民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较低,储蓄意愿更高,使农村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显著提升(胡中立等,2024)^[13]。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非农领域就业对提升农村家庭财务韧性具有重要作用(尹志超等,2025)^[14]。

尽管相关研究在理论上提示非农就业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但对其中的作用机制探究不足,且缺乏相关经验证据。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究非农就业如何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9 年及 2015 年和 2017 年的数据,从不敷出和资不抵债两个维度测量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实证检验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

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拓展了农村金融风险治理的研究边界。金融风险是当前我国重点防范的风险,而农村金融是金融系统中的薄弱环节,但现有文献对农村家庭金融风险的关注较少。本文证实了非农就业是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有效途径,为通过促进非农就业防范农村金融风险提供了事实依据。第二,揭开了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黑箱”。本文从社会网络、收入稳定性和金融可得性3个方面探究了非农就业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并从年龄、产业、学历3个维度考察了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异质性,有助于提高政策设计的针对性和精准性。第三,与相关研究大多限于静态分析不同,本文进一步采用多期样本检验了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时间动态效应,有助于全面认识非农就业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积极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非农就业使农村家庭收入多元化,减少了农村家庭对单一务农收入的依赖,并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总收入(胡伟等,2022)^[15],能够直接缓冲因灾害歉收或市场波动导致的农村家庭收入下降风险(肖龙铎等,2017)^[16]。不仅如此,和纯农户相比,非农就业群体具有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服务,进一步提高了非农就业家庭抵抗不确定风险冲击的能力,使非农就业家庭财务更加平滑、稳健,从而降低非农就业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周博文等,2024)^[8]。社会保障力度的不足是诱发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Anderloni et al., 2012;周博文等,2024)^{[4][8]}。尽管农民工可能被排除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之外,只能选择回到原籍参加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卢文秀等,2023)^[17],但其受风险意识影响,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参保率显著高于在农村务农的纯农户;而且农民工能够更加快捷和便利地享受城镇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使其面临健康风险威胁的可能性明显下降(邓睿,2019)^[18]。此外,针对非农就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就业帮扶等公共服务日益健全,进一步提升了农民工应对潜在风险冲击的抵抗能力。因此,相比纯农户,非农就业既能直接提升农村家庭总收入,还可以通过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分散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1:非农就业显著缓解了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2. 非农就业、社会网络与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中国农村社会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了“差序格局”,其典型特征是“公”与“私”的界限处于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家”的概念也具有伸缩性,人际关系的强弱更多地依赖情感和交情,而非契约。尽管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外移使农村原有的关系网络受到冲击,宅基地退出与农地规模化经营进一步弱化了以土地为载体的邻里互助纽带,但在数字通信技术和现代交通工具的支撑下,通过数字通信和高速铁路能够实现亲属间跨时空互动,由此催生出虚实融合的新型社会网络联结机制,有效缓解了亲属地理分割导致的情感断层和关系疏离,使非农就业后农民工原有的关系网络仍能得到有效维持。事实上,由于信息搜寻能力较差,再加上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带来的信息壁垒及信息桥缺失,农民工对就业信息的获取存在滞后性,大部分农民工的非农就业往往借助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实现(刘启超,2025)^[19]。而且,受传统互助文化影响,非农就业的农民工呈现出同乡聚居的特征,这将强化其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在由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内部成员具有明显的互帮互助性质。在金融市场不完善、借贷不完全的情景下,社会网络内部的风险分担成为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重要保障机制,能够有效提升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Ambrus et al., 2014)^[20]。家庭拥有的社会网

络越庞大,从社会网络内部获得非正规保险以实现风险分担的能力就越强,越有助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降低(杨汝岱等,2011;王春超等,2016;姚健等,2024)^[21-23]。因此,非农就业能够通过新增的业缘关系显著扩大农民工家庭的关系网络(刘涛等,2023;刘启超等,2024)^[24-25],进而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2:非农就业能够通过扩大社会网络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3. 非农就业、收入稳定性与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收入波动会直接削弱家庭储蓄积累能力,增加家庭现金流断裂风险,降低家庭缓冲负面冲击的抗风险能力,使其难以应对重大疾病或失业等带来的突发性支出,从而加剧家庭债务压力与收入不匹配的矛盾。特别是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农作物产量不稳,农业收入随之产生波动,显著增加了农户入不敷出的可能性(Cui et al., 2024)^[26]。更重要的是,收入不稳定的家庭更容易受到信贷约束,在预防性储蓄不足的情景下,正规信贷的排斥导致其被迫通过非正规高息借贷来应对日常开支或偿还到期债务,从而进一步加剧家庭金融脆弱性。因此,收入稳定对维持家庭债务偿付能力、减少因收入骤降导致的违约风险、降低风险敞口暴露概率,进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至关重要。根据干中学理论,农民工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和实践,能够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由此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显著增强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帮助其实现稳定就业,进而获得稳定收入(向国成等,2013)^[11]。此外,随着就业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民工就业的选择更加多元化,并不断正规化。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农民工与雇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超过2/3。签订劳动合同使农民工失业预期下降,收入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非农就业既可以通过“技能赋能→岗位适配→工资提升”实现收入总量增加,也可以通过“渠道多元+就业正规→风险分担”实现收入稳定性提升,从而缓解由收入不确定带来的家庭金融脆弱性(葛永波等,2022)^[27]。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3:非农就业能够通过提高收入稳定性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4. 非农就业、金融可得性与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由于人口密度相对较低,设立金融服务网点的辐射范围有限且固定成本偏高,阻碍了金融服务向农村地区下沉,导致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与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不匹配。同时,农村家庭拥有的宅基地、农机具等主要资产变现能力弱,难以满足金融机构的抵押担保要求,再加上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不稳定、信用记录不规范,容易被界定为高风险群体,使得很多农村家庭被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黄红光等,2018)^[28]。金融排斥导致农村家庭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生产性投资,在面临自然灾害、价格波动等风险时也缺乏有效的应对工具,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后,由熟人社会转入市场体系,薪资的发放、转移和结算大多通过银行系统处理,日常消费和日常缴费等不再使用现金,而是转为基于智能终端的数字支付。也就是说,非农就业后,农民工主动或被动接受金融服务的场景明显增加。同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边际生产率更高的领域,将推动其收入水平提高,并激发其理财、保险等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葛永波等,2022)^[27]。为了更加合理配置自有资金,农民工会积极搜寻金融信息、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金融决策能力,主动融入现代金融体系。因此,非农就业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家庭的金融可得性,而金融可得性的增强将进一步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4:非农就业能够通过增强金融可得性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三、研究设计

1. 基准模型设定

要检验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首先需要评估家庭金融脆弱性。本文借鉴 Ampudia 等(2016)^[3]、张正平和陈杨(2023)^[29]的研究,从“入不敷出”和“资不抵债”两个维度测量家庭金融脆弱性。其中,“入不敷出”以家庭现金流量表为基础,当家庭收入减家庭支出小于0时,判定为“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以家庭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当家庭资产减家庭负债小于0时,判定为“资不抵债”;若“入不敷出”和“资不抵债”同时出现,则家庭存在金融脆弱性(赋值为1),否则不存在金融脆弱性(赋值为0)。由于被解释变量金融脆弱性为虚拟变量,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构建基准模型如式(1)所示:

$$\ln\left(\frac{P_j}{1-P_j}\right) = \alpha_0 + \alpha_1 Fnjy_i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P 为家庭存在金融脆弱性的概率;核心解释变量($Fnjy$)“非农就业”为虚拟变量,借鉴田鸽和张勋(2022)^[30]的设定,若样本有工作且行业性质为非务农,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X 表示控制变量,借鉴李波和朱太辉(2020)^[9]、龙海明和闫文哲(2024)^[7]的做法,从居民个体特征、社会保障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3个维度选取12个控制变量(详见表1); ε_i 为误差项。

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管理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主要采用201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并采用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考察动态效应。删除城镇户籍样本,仅保留农村户籍样本,并删除年龄低于18岁和大于65岁的样本。拥有极高收入或资产的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强,金融脆弱性缺乏弹性;相反,收入或资产匮乏的家庭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不论是否进行非农就业,存在金融脆弱性的概率都较高。因此,非农就业在短时间内无法显著影响极高和极低收入(资产)家庭的财务和金融状况。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剔除收入和资产存量处于前5%和后5%的样本。表1报告了2019年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金融脆弱性	“入不敷出”且“资不抵债”=1,否则=0	36 269	0.028	0.167	0	1
非农就业	有工作且行业性质为非务农=1,否则=0	36 269	0.413	0.492	0	1
性别	男=1,女=0	36 269	0.503	0.499	0	1
年龄	单位:岁	36 269	44.434	13.657	18	65
学历	没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中职/中专=5,大专/高职=6,大学本科=7,硕士=8,博士=9	36 197	3.103	1.455	1	9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36 269	0.841	0.365	0	1
健康水平	非常好=1,好=2,一般=3,不好=4,非常差=5	36 264	2.618	1.018	1	5
养老保险	有=1,无=0	36 269	0.654	0.475	0	1
医疗保险	有=1,无=0	36 269	0.920	0.271	0	1

续表 1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失业保险	有=1,无=0	36 269	0.035	0.186	0	1
商业保险	有=1,无=0	36 269	0.064	0.246	0	1
人均收入	所在城市全样本的人均收入	36 269	6.518	3.650	1.389	40.445
智能化水平	所在城市全样本的智能手机使用率	36 269	0.703	0.122	0.311	0.976
汽车保有率	所在城市全样本的汽车保有率	36 269	0.290	0.132	0.013	0.680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

采用 2019 年样本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2。在逐步加入个人特征、社会保障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控制变量过程中,“非农就业”的估计系数始终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非农就业样本存在金融脆弱性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样本,即非农就业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出现金融脆弱性的概率,假说 H1 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金融脆弱性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非农就业	-0.768***(-10.394)	-0.653***(-8.403)	-0.608***(-7.742)	-0.535***(-6.758)
性别		0.180*** (2.667)	0.177*** (2.619)	0.153** (2.263)
年龄		-0.033***(-10.529)	-0.029***(-8.777)	-0.026***(-7.943)
学历		-0.101***(-3.548)	-0.095***(-3.278)	-0.065**(-2.245)
婚姻状况		0.175 (1.625)	0.221** (2.044)	0.239** (2.203)
健康水平		0.549*** (15.843)	0.549*** (15.831)	0.533*** (15.301)
养老保险			-0.291***(-3.906)	-0.295***(-3.950)
医疗保险			-0.415***(-4.020)	-0.458***(-4.410)
失业保险			-0.451(-1.442)	-0.225(-0.714)
商业保险			-0.057(-0.385)	0.015(0.102)
人均收入				-0.072***(-4.039)
智能化水平				0.525*(1.727)
汽车保有率				-1.130***(-3.259)
常数项	-3.322***(-88.184)	-3.406***(-16.534)	-3.109***(-13.985)	-2.885***(-9.873)
<i>N</i>	36 269	36 176	36 176	36 176
<i>R</i> ²	0.013	0.049	0.054	0.061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表同。

进一步分别采用 2015 年和 2017 年的样本进行基准回归,以考察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趋势,检验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呈加大趋势(见图 1),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不断增强。这种时间趋势产生的原因来自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自身和外部政策环境两方面:

从非农就业劳动力自身来看,早期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受学历及工作技能的限制,大多集中在低技能、高流动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强度高、收入波动大,非农就业对其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相对有限。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特征逐步消失,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逐渐减弱,农民工在就业市场的议价能力上升(许岩,2022)^[31];同时,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不断提升,有机会获得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并通过创业、兼业等方式拓展收入渠道,使其非农就业更有效地增强了家庭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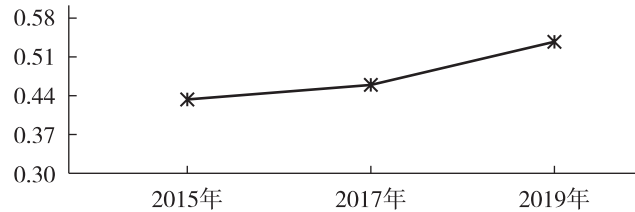


图1 “非农就业”系数绝对值变化趋势

从外部环境来看,政府部门不断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使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得到强化。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2019年国务院出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持续加大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力度,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工资。2024年11月,人社部、住建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24]80号),从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促进进城农民工均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推动农民工就业增收、更好融入城市。系统性制度设计逐步消解了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推动其从“流动”向“扎根”转变,使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不断强化。

2. 稳健性检验

(1)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双重机器学习不仅能够整合大量混淆因子,还能捕捉变量间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精准识别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郭峰等,2023;陈苗等,2025)^[32-33]。因此,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不同机器学习方法的估计结果见表3,均表明非农就业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出现金融脆弱性的概率。

表3 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检验结果

变量	金融脆弱性				
	随机森林	拉索回归	梯度提升	神经网络	支持向量机
非农就业	-0.009*** (-4.032)	-0.011*** (-5.424)	-0.011*** (-5.305)	-0.011*** (-5.307)	-0.011*** (-5.3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3 136	33 136	33 136	33 136	33 136

(2)随机选取样本数量。理论上,如果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稳健,那么,从全样本中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样本进行检验应得出与全样本一致的结论。本文从全样本中随机抽取10%、20%、30%、40%、50%、60%、70%、80%和90%的样本,分别进行检验(见图2)，“非农就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

结果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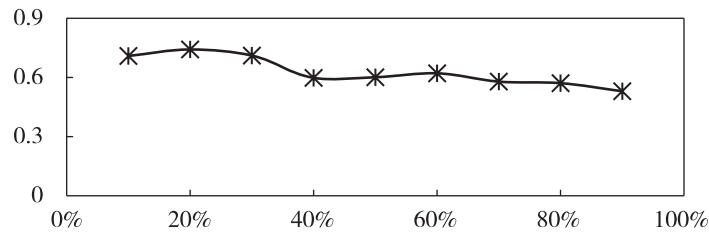


图 2 随机选取样本检验的“非农就业”系数绝对值

(3) 安慰剂检验。本文通过虚构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根据存在家庭金融脆弱性样本和非农就业样本在全部样本中的占比, 随机生成新的家庭金融脆弱性样本和非农就业样本, 分别用虚构的“伪金融脆弱性”和“伪非农就业”变量代替原变量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A, 系数估计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4) 更改聚类层级。本文基准模型回归采用的是稳健标准误, 为进一步控制行业 and 地区层面随机因素的影响, 分别聚类到地区和行业层面重新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B, “非农就业”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5) 扩大样本容量。进一步采用 2015 年、2017 年、2019 年 3 年的样本, 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C。扩大样本容量后, 不论是采用 Logit 模型, 还是双重机器学习随机森林方法, 均表明非农就业显著缓解了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Panel A: 虚构处理组		Panel B: 更改聚类层级		Panel C: 扩大样本容量	
	金融脆弱性	伪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	
			地区	行业	Logit 模型	随机森林方法
非农就业	0.030 (0.403)		-0.497*** (-5.444)	-0.512*** (-3.742)	-0.443*** (-9.207)	-0.007*** (-4.669)
伪非农就业		-0.100 (-0.793)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i>N</i>	33 136	33 136	33 136	32 954	83 508	83 508
<i>R</i> ²	0.002	0.053	0.058	0.058	0.065	-

注: 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 下表同。

3. 内生性讨论

(1) 遗漏变量问题。基准模型不可避免地存在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问题, 借鉴 Altonji 等 (2005)^[34] 的方法, 通过系数值的变化间接估算模型偏误多大程度来自参数估计偏差。从表 2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可知, 未加入控制变量时“非农就业”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估计系数为 -0.768, 加入控制变量后估计系数变为 -0.535, 遗漏变量偏误系数大于 $1 \left(\left| \frac{-0.535}{[-0.768 - (-0.535)]} \right| = 2.30 \right)$, 表明基准回归中因遗漏

变量导致估计结果有偏的可能性较小。

(2) 反向因果问题。当农村家庭出现金融脆弱性时, 可能倒逼其脱离农业, 转向收入更高的非农业。因此, 非农就业在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同时, 也会受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为缓解基准模型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选取非农就业的同群效

应作为工具变量, “同群效应” (X_p) 计算方法为: $X_p = \frac{\sum_{j \neq i} X_j}{m-1} = \frac{\sum_{j=1}^n X_j - X_i}{m-1}$ 。其中, n 为 i 样本所在县域的样本总量, m 为该县域非农就业的样本量, X 为样本是否非农就业的虚拟变量。同群效应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学习模仿、收入追求等影响农户的非农就业行为(刘涛等, 2023)^[24], 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 同时, 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主要受自身因素以及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的影响, 与其他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行为没有直接联系, 因此, 同群效应也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见表 5, 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问题, 同时, “非农就业”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 非农就业显著缓解了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结论仍然成立。

表 5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变量	非农就业	金融脆弱性		
		Iv-reg2	Iv-probit	Iv-dml(rf)
同群效应	0.753*** (32.031)			
非农就业		-0.128*** (-10.821)	-2.033*** (-10.177)	-0.007** (-2.419)
LM		997.958***		
Wald F		1 025.872***	91.88***	
N	36 176	36 176	36 176	36 176

4. 机制检验

借鉴江艇(2022)^[35]的研究, 本文通过考察非农就业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和中介变量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 同时采用传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进行补充检验。需要说明的是, 当被解释变量为非虚拟变量时, 采用 OLS 回归进行检验。根据前述理论分析, 构建以下 3 个中介变量: 一是“社会网络”, 基于是否获得亲朋好友的转移性收入和是否向亲朋好友进行转移性支出构建虚拟变量(若从亲朋好友获得转移性收入或向亲朋好友进行转移支付, 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用以检验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此外, 考虑到农村社会网络存在人情负担等负面效应, 可能会对农村家庭财务结构带来不利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人情支出”变量(人情支出与总收入之比), 以控制人情负担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二是“收入稳定性”, 根据样本对问题“总收入状况如何”的选项构建虚拟变量(选择“增加很多”“增加一点”或“基本不变”赋值为 1, 选择“减少一点”和“减少很多”则赋值为 0), 用以检验收入稳定性的中介作用。三是“金融可得性”, 借鉴尹志超等(2015)^[36]的方法, 以家庭拥有的银行卡和信用卡账户数量衡量, 用以检验金融可得性的中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6。

(1) 扩大社会网络路径。如表 6 的 Panel A 所示, 非农就业显著扩大了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 而农村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显著降低了其金融脆弱性, 即非农就业通过扩大社会网络缓解了农村家庭金融脆

弱性, 假说 H2 得证。在金融市场不完善和借贷不完全导致农户无法依靠银行借贷缓释风险冲击的情形下, 社会网络内部的风险分担能够有效弥补正规信贷的缺失, 成为农村家庭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保障机制。非农就业的社会网络扩大效应使农村家庭能够从社会网络内部获得更多的非正规保险, 从而通过风险分担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姚健等, 2024)^[23]。

(2) 提高收入稳定性路径。如表 6 的 Panel B 所示, 非农就业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稳定性, 而农村家庭收入稳定性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其金融脆弱性, 即非农就业通过提高收入稳定性缓解了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假说 H3 得证。家庭金融脆弱性主要由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决定, 其主要原因在于收入的下降和支出的增加。因此, 可持续的收入流量对于维护家庭财务稳健至关重要。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条件, 农业收入增长有限且具有不稳定性, 导致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较高; 相反, 非农就业既可以分散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风险与价格波动风险, 也可以通过干中学积累人力资本, 实现收入的稳定增长, 从而降低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3) 增强金融可得性路径。如表 6 的 Panel C 所示, 非农就业显著增强了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 而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的增强显著降低了其金融脆弱性, 即非农就业通过增强金融可得性缓解了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假说 H4 得证。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非农产业后, 基于人情的社会交往模式转变为基于价格的市场交易模式, 不论是非农就业场景推动其金融需求升级, 还是其技能升级与金融需求的耦合, 均能有效增强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 使其面临意外冲击时能够利用更多的外部金融资源平滑经济损失, 从而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温涛等, 2025)^[37]。

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Panel A: 扩大社会网络路径			
变量	社会网络	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
非农就业	0.509*** (7.553)		-0.540*** (-6.403)
社会网络		-0.054*** (-7.297)	-0.052*** (-6.990)
人情支出	0.492 (1.406)	-0.035 (-0.278)	-0.033 (-0.260)
<i>N</i>	30 793	30 973	30 793
<i>R</i> ²	0.077	0.060	0.065
Panel B: 提高收入稳定性路径			
变量	收入稳定性	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
非农就业	0.179*** (6.255)		-0.475*** (-6.403)
收入稳定性		-0.713*** (-10.510)	-0.701*** (-10.314)
<i>N</i>	33 136	33 136	33 136
<i>R</i> ²	0.010	0.065	0.070
Panel C: 增强金融可得性路径			
变量	金融可得性	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
非农就业	0.343*** (10.900)		-0.442*** (-5.435)
金融可得性		-0.188*** (-7.681)	-0.177*** (-7.275)
<i>N</i>	31 933	31 933	31 933
<i>R</i> ²	0.059	0.060	0.064

五、拓展性讨论

1. 异质性分析

(1) 非农就业人员年龄异质性。本文将 1990 年及之后出生的样本划归“新生代”组、1970 年至 1990 年出生的样本划归“中生代”组、1970 年之前出生的样本划归“老一代”组, 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7 的 Panel A。3 组样本中, “非农就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但从系数绝对值看, “新生代”>“中生代”>“老一代”, 且组间系数差异显著 (Chow 检验的 P 值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随着非农就业人员年龄的增长,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逐渐减弱。这是因为相比年长的农村劳动力, 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往往具有明显的人力资本优势, 更易实现多元化、高质量的非农就业, 且非农就业的预期时间更长, 能够为农村家庭带来更快、更稳定的收入增长, 进而更大程度地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2) 非农就业的产业异质性。本文样本中, 非农就业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占比分别为 18.72% 和 18.49%, 从事服务业的占比为 37.34%。基于此, 将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样本归为“第二产业”、从事零售餐饮等服务业的样本归为“第三产业”。同时, 考虑到不同产业的劳动用工状态存在差异, 在该检验中加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固定劳动合同签订率两个变量, 以控制产业差异的影响。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7 的 Panel B。两组样本中, “非农就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但“第三产业”组的系数绝对值显著大于“第二产业”组, 表明相比在第二产业的非农就业, 在第三产业的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更强的缓解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工作强度较高, 但收入较低, 且在样本期间的劳动需求趋于收缩, 因而在该领域非农就业的收入增长较慢、收入稳定性较低。

(3) 非农就业人员学历异质性。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样本归为“低学历”组、高中和中专学历的样本归为“中学历”组、大学(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样本归为“高学历”组, 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7 的 Panel C。3 组样本中, “非农就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但从系数绝对值看, “高学历”>“中学历”>“低学历”, 且组间系数差异显著, 表明随着非农就业人员学历的提高,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逐渐增强。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学历越高, 非农就业的能力越强, 越能够获得更好的非农就业机会, 并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实现更快更持久的收入增长, 从而更有效地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姚健等, 2024)^[23]。

表 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Panel A: 年龄异质性			Panel B: 产业异质性		Panel C: 学历异质性		
	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		
	新生代	中生代	老一代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低学历	中学历	高学历
非农就业	-0.725*** (-3.164)	-0.670*** (-5.270)	-0.419*** (-3.169)	-0.304** (-2.568)	-0.454** (-2.033)	-0.460*** (-5.080)	-0.633*** (-2.817)	-1.092*** (-3.447)
N	4 945	12 079	17 276	12 716	12 736	26 703	5 867	3 606
R^2	0.053	0.073	0.069	0.063	0.059	0.061	0.050	0.118
Chow 检验	2.07***			36.81***		2.18***		

2. 家庭金融脆弱性分维度检验

本文进一步将构成“金融脆弱性”变量的两个维度(“人不敷出”和“资不抵债”)进行拆分, 分别检验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入不敷出和资不抵债的影响,以探究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现金流量和资产负债的改善是否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见表8。单独使用2019年样本和同时使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样本的分析均表明,非农就业同时缓解了农村家庭的入不敷出和资不抵债,其中对入不敷出的缓解作用更强,即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主要来自现金流量的改善。原因在于,非农就业可以即时增加农村家庭的现金流入总量,对现金流量的改善是直接的,能够在短期内产生显著效果;而资产负债是存量与增量综合的结果,其改变往往需要时间积累,在现金流入增加后,需持续增加预防性储蓄、降低家庭债务,才能实现家庭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

表8 家庭金融脆弱性分解检验结果

变量	入不敷出		资不抵债	
	2019年样本	3年样本	2019年样本	3年样本
非农就业	-0.734***(-46.815)	-0.736***(-46.762)	-0.256***(-6.481)	-0.265***(-6.711)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36 176	83 508	36 176	83 058
R ²	0.051	0.046	0.046	0.041

六、结论与启示

农村地区金融风险防控基础较为薄弱,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相对单一、资产规模有限,一旦遭遇金融风险冲击,较易陷入财务困境。因此,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2017年、2019年的数据,从入不敷出和资不抵债两个维度测度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检验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农就业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存在金融脆弱性的概率,而且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第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通过扩大农户社会网络、提高农户收入稳定性、增强农户金融可得性3条路径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随着非农就业人员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弱,随着非农就业人员学历的提高逐渐增强;在第三产业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比在第二产业非农就业更强。第四,非农就业同时降低了农村家庭入不敷出和资不抵债的发生概率,其中对入不敷出的缓解作用更强。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推动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规范化,提升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稳定性。切实强化农村家庭财务可持续性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意义重大,本文研究表明,非农就业使农村家庭存在金融脆弱性的概率明显下降。为此,需进一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后的权益保护,稳定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收入预期,以更好地发挥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财务韧性的改善作用。此外,考虑到农村居民在县城进行非农就业的占比持续提高,需重点发展县域经济,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县域梯度转移,提高县域非农就业吸纳能力。

第二,扩大农村家庭社会网络,提升农村家庭收入稳定性,增强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有效降低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本文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收入稳定性和金融可得性是非农就业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作用路径。因此,可从这3个方面入手进一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搭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者社群平台,鼓励成立行业协会、同乡会等社群团体,扩大农村家庭社会网络资源;建立非农就业收入保

障机制,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收入稳定性;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推广手机银行、线上贷款等便捷金融服务,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可及性。

第三,制定差异化政策,更加精准地发挥非农就业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积极作用。本文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在不同代际、就业行业和教育经历等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因此,应针对弱势群体制定差异化的帮扶政策。一方面,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金融基础知识宣传和教育,强化其理性消费与债务管理能力培训;另一方面,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非农就业能力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岗位适配能力。

参考文献:

- [1] 张冀,史晓,曹杨. 动态健康冲击下的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评估[J]. 财经研究, 2022, 48 (2): 153-168.
- [2] 徐佳,李冠华,齐天翔.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 衡量与影响因素[J]. 金融研究, 2022 (11): 98-116.
- [3] Ampudia M, Vlokhoven H V, Zochowski D. Financial fragility of euro area households[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6, 27: 250-262.
- [4] Anderloni L, Bacchiocchi E, Vandone D.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J].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12, 66 (3): 284-296.
- [5] Lusardi A, Schneider D, Tufano P. Financially fragile household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R]. NBER Working Paper, 2011.
- [6] Daud S N M, Marzuki A, Ahmad N, et al.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d its determinants: survey evidence from Malaysian households[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9, 55 (9): 1991-2003.
- [7] 龙海明,闫文哲. 退休对城镇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冲击[J]. 经济学动态, 2024 (12): 128-140.
- [8] 周博文,臧旭恒. 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24 (12): 111-127.
- [9] 李波,朱太辉. 债务杠杆、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脆弱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4 的实证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 2020 (7): 25-34.
- [10] 王春超,冯大威. 中国乡-城移民创业行为的决定机制——基于社会关系网的分析视角[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 (1): 355-382.
- [11] 向国成,曾小明,韩绍凤. 农村家庭异质性、转移就业与收入回报——基于匹配估计量的经验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 (11): 46-56.
- [12] 向国成,湛亭颖,钟世虎,等. 分工、均势经济与共同富裕[J]. 世界经济文汇, 2017 (5): 40-54.
- [13] 胡中立,王书华. 劳动力流动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实证分析[J]. 金融论坛, 2024, 29 (2): 59-69.
- [14] 尹志超,张安.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J]. 财贸经济, 2025, 46 (1): 81-98.
- [15] 胡祎,杨鑫,高鸣. 要素市场改革下农户非农就业的增收逻辑[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 (7): 78-95.
- [16] 肖龙铎,张兵. 金融可得性、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 2017 (2): 74-87.
- [17] 卢文秀,吴方卫. 患寡亦患不均: 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与农民工过度劳动[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 (7): 100-123.
- [18] 邓睿. 健康权益可及性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4): 92-110.
- [19] 刘启超. 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民工实现正规就业吗[J]. 农业技术经济, 2025 (2): 113-128.
- [20] Ambrus A, Mobius M, Szeidl A. Consumption risk-sharing in social network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 (1): 149-182.

- [21] 杨汝岱, 陈斌开, 朱诗娥.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J]. 经济研究, 2011, 46 (11): 116-129.
- [22] 王春超, 袁伟. 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与农户储蓄率[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 (3): 25-35, 53.
- [23] 姚健, 臧旭恒, 周博文. 社会网络与中国家庭金融脆弱性[J]. 金融研究, 2024 (4): 151-168.
- [24] 刘涛, 秦志龙, 伍骏骞. 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 (9): 101-121.
- [25] 刘启超, 王亚华. 稻作文化对农民工回乡聚居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 (8): 107-124.
- [26] Cui X, Zhong Z. Climate change, cropland adjustments, and food secur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4: 103245.
- [27] 葛永波, 陈虹宇. 劳动力转移如何影响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金融排斥的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 (3): 128-146.
- [28] 黄红光, 白彩全, 易行. 金融排斥、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发展[J]. 管理世界, 2018, 34 (9): 67-78.
- [29] 张正平, 陈杨.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基于 CFPS2010—2018 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J]. 国际金融研究, 2023 (6): 26-37.
- [30] 田鸽, 张勋. 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J]. 管理世界, 2022, 38 (5): 72-84, 311.
- [31] 许岩. 市民化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共同富裕——对“农转非”居民工资同化过程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22 (3): 130-148.
- [32] 陈茁, 陈云松. 双重机器学习在社会科学因果推断中的应用[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 (6): 72-85, 158.
- [33] 郭峰, 陶旭辉. 机器学习与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 一个文献综述[J]. 经济学 (季刊), 2023, 23 (1): 1-17.
- [34] Altonji J G, Elder T E, Taber C R. Selection on observed and unobserved variable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atholic school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 (1): 151-184.
- [35]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5): 100-120.
- [36] 尹志超, 吴雨, 甘犁. 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J]. 经济研究, 2015, 50 (3): 87-99.
- [37] 温涛, 刘亭廷. 数字金融使用能缓解城乡家庭金融脆弱性吗[J]. 金融经济研究, 2025, 40 (1): 39-59.

How Does Off-Farm Employment Alleviat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 Rural Households?

ZHANG Yongfeng¹, LEI Jian², LU Yao³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Party School of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Nanjing 210003, Jiangsu, China; 2. PBC School of Fi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3, Jiangsu, China)

Summary: Reasonable debt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households to smooth intertemporal consumption and maximize household utility. However, the rapid growth of household debt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has severely undermined household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and threatened systemic financial stability. In particular, compared with urban households, rural households face more unstable income due to their relatively single income sources and frequent shocks from natural disasters. Moreover, financial exclusion target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further exacerbates liquidity constraints for rural households. As a result, the proportion of financially vulnerable rural households has not only shown an upward trend but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rban households (Xu Jia et al., 2022).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coordinat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continue to write a new chapter featuring the “two miracle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Against this backdrop, how to reduce th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enhance their financial resili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must be highly prioritized and addressed.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ff-farm employment among rural laborers,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methods of Ampudia et al. (2016) and adopts the framework of Zhang Zhengping and Chen Yang (2023) to measure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from two dimensions: “income failing to cover expenditure” and “assets insufficient to cover liabilities.” Based on this, it examines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th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that off-farm employment expands social networks, enhances income stability, and improves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likelihood of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 rural households. This effect primarily stems from improvements in rural household cash flow. However, the mitigating effe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rural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exhibits clear asymmetry, being more pronounced in alleviating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those employed in the tertiary sector, and rural residents with a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Dynamic effect tests show that the mitigating effe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rural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tensifies over time.

Compared with existing research, this study extends the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it dissects the “black box” of how off-farm employment affects rural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t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the mechanisms, asymmetric effects, and moderating effects through which off-farm employment influences rural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networks, income stability, and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thereby helping to enhance the precision of policy design. Second, this paper assesses both the static effects and the dynamic trends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rural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Unlike most existing studies that remain at the static analysis level, this paper further examin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mitigating effe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This enabl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positive role of off-farm employment in alleviating rural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Financial risk is currently a key area of concern in China’s risk prevention effort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construct and improve policy systems for preventing rural financial ris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ff-farm employment among rural laborers. This contributes to better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achieving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income stability; financial access; cash flow; assets and liabilities; household financial resilience

CLC number: F323.6; F832.48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6)02-0145-15

(编辑:朱 艳;刘仁芳)